

被虚掩的真主角：从阿席达卡的复杂立场看《幽灵公主》的存在主义美学

孙钰榆 曹晓晓

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省杭州市，310018；

摘要：《幽灵公主》作为宫崎骏1997年的生态寓言，常被解读为自然与文明的对抗史诗。然而，其哲学深度更体现在少年阿席达卡的存在主义觉醒中。他并非简单的叙事纽带，而是宫崎骏精心塑造的“真主角”——在荒诞世界中觉醒自我、在价值废墟上践行选择、在伤痛中追寻生命意义的哲学象征。本文突破传统生态批评框架，以存在主义美学视角重新解读：影片真正探讨的并非人与自然的简单对立，而是通过被诅咒的阿席达卡，呈现存在主义英雄的成长诗篇。当世界沦为价值混乱的战场，个体被抛入意义真空的深渊时，如何像阿席达卡一样，在诅咒与救赎的辩证中书写生命诗学，正是《幽灵公主》留给时代最深刻的叩问。

关键词：存在主义美学；《幽灵公主》；阿席达卡；荒诞性；自由选择

DOI：10.64216/3080-1486.26.03.083

绪论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充斥着荒诞，人生注定要面对虚无的拷问。而《幽灵公主》的叙事空间，恰是这一命题的具象化。阿席达卡以“被诅咒者”身份登场，其右手伤痕既是命运烙印，亦是存在主义困境的隐喻——因拯救族人而沾染邪神之力，他被迫游走于文明与自然的夹缝。这种“中间状态”契合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核心命题（萨特，1987）：他既无法回归被诅咒玷污的故乡本质，亦无法被任何一方的既有价值所完全定义，其流放之旅因而成为一场不断重塑自我、通过行动定义生命意义的实践。

不同于珊的绝对自然守护与黑帽的执着人类开拓，阿席达卡的抉择始终贯穿萨特“自由承担”的重负精髓。他的每一次介入——无论是试图调和冲突，还是在神怒与人欲间徘徊——都不是被动反应，而是对存在主义“自由选择”及随之而来之全部责任的生动诠释。影片结尾，他以伤痕之躯拥抱世界的复杂性与不完美，完成了对海德格尔“向死而生”命题的具身化超越——生命的意义，并非预先给予，而是诞生于对荒诞的直面、对选择的承担以及对“共在”可能性的执着开拓之中。这种在价值撕裂中保持清醒的痛感并毅然承担介入责任的姿态，恰是宫崎骏赋予现代人的存在主义成长诗学。

1 被抛入世的“局外人”的觉醒

阿席达卡的旅程始于一场典型的“被抛”状态。为

拯救村民而弑杀野猪神，并非出于主动的善恶选择，而是被突然抛入一个敌对情境的无奈之举。海德格尔指出，此在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被抛”的“能在”，这种无家可归的原始状态构成了此在的基本境况。诅咒的降临，粗暴地打断了阿席达卡作为部落守护者的本质化生活，将他抛入一个全然荒诞的宇宙：善行招致恶果，意义链条彻底断裂。他的遭遇因而成为人类在宏大历史与不可控力量面前的缩影：个体在追寻意义的道路上，往往被抛入价值的深渊。

被部落放逐后，阿席达卡成为了萨特与加缪哲学意义上的“局外人”。他剥离了社会赋予的“战士”、“继承人”等既定本质，被迫直面存在的根本性孤独与自由。这种流放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觉醒：他意识到自己必须为自身的存在全权负责。正如萨特所言，“人是被判了自由之刑的”，阿席达卡的诅咒正是这“自由之刑”的显形，迫使他必须通过选择来创造自己的价值。他的困境亦与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同构：被抛入一个无意义的循环，即寻找解除诅咒之法，而这循环本身，正是人类文明与自然冲突这一荒诞现实的象征。

作为穿梭于人类、自然与神性三方势力间的“中间者”，阿席达卡陷入了深刻的生存论孤独。他理解黑帽为群体生存的挣扎，却无法认同其掠夺逻辑；他共情珊被遗弃的创伤与守护的执着，却无法接受其灭绝人类的仇恨；他敬畏山兽神的法则，却必须面对“诅咒永存”的宿命。这种“三方不接纳”的撕裂感，深刻体现了萨

特“他人即地狱”的哲学维度。“我是他人注视和评判的对象，他人也是我注视和评判的对象，然而我不知道他人如何审视我，他人也不知道我如何审视他，故而他人的存在在于我是一种永久的危险，反之亦然。因而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审视，互相逃避，互相排斥的关系，但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他人，我便失去依托和参照。”此处的“地狱”并非指人际的必然恶意，而是揭示当个体陷入无法调和的他者目光与价值体系审视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异化与囚禁感。阿席达卡置身于多方“注视”之下，每一方都试图将他固化为己方价值的附庸，而他则必须在这些相互冲突的“地狱”之间，艰难地捍卫自己选择的主体性。

阿席达卡与珊的情感关系，将这种存在主义困境推向极致。两个“弃儿”在寒冷的世界中相互取暖，却因根本价值观的差异而无法达成本质性的和解。“分居两界”的结局，亦昭示了宫崎骏深刻的悲观洞察：爱无法消弭源于生存论层面的根本冲突。然而，这并未导向绝望。他们的关系成为一种加缪式“反抗”的隐喻——反抗不是为求胜利，而是在清醒认知荒诞与分歧的前提下，依然选择看见、理解并尊重对方的存在。阿席达卡的整个旅程，因而成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哲学隐喻：当生存沦为唯一暴政，文明将陷入自我诅咒的循环；唯有像他一样，在绝望中依然坚持选择、承担对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才能在撕裂的世界中，于行动里寻觅救赎的微光。

2 超越二元对立的行动哲学

塔塔城与森林的冲突，是工业文明与自然崇拜、进步叙事与守护信仰的激烈对撞。阿席达卡拒绝站队任何一方的本质化立场，其行动哲学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体现了存在主义选择自由的最高典范。萨特指出，“自欺”是人逃避自由重负的主要方式，即把自己等同于某个固定的角色或价值（如“复仇者”、“守护者”），从而免除选择的痛苦。阿席达卡则始终抗拒这种“自欺”。他深刻体认黑帽发展生存的无奈与珊守护信仰的正义，同时也清醒看到前者掠夺的残酷与后者仇恨的局限。他拒绝被任何抽象的口号或阵营身份所定义，其选择始终植根于对每一个具体情境、每一个鲜活“他者”的回应。

这种“情境伦理”在阿席达卡的行动中得到充分展现。当工人面临山犬攻击时，他阻止珊的复仇，并非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而是基于对眼前个体生命的共情、救护。当炼铁厂遭遇神兽报复时，他奋力保护黑帽及其

团队，亦非认同其扩张逻辑，而是出于对人类群体生存权这一基本事实的承认。这种回应方式，暗合了列维纳斯“他者之脸”的伦理学诉求——他者的痛苦与需求，作为一种绝对的命令，要求我做出回应，这种回应优先于任何抽象的主义或法则。阿席达卡的伦理实践，正是在一个个具体情境中，直面“他者之脸”，并做出负责任的干预。

在加缪的意义上，阿席达卡反复强调的“活下去”，绝非对荒诞世界的被动妥协或犬儒主义的生存至上。相反，这是一种积极的、将荒诞转化为意义的“反抗”行动。他背负着诅咒——这联结着自然伤痛与人类罪责的象征——穿行于战场，其伤口流出的鲜血，仿佛成了连接不同生命阵营的媒介。他对珊说出“一起活下去”的承诺，更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重要时刻：将个体的生存选择，提升为一种对“共在”可能性的责任与构筑。这打破了霍布斯式“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预言，指向了一种基于共同生存责任的新型关系。

这种存在主义行动哲学最终指向的是人类文明的存续之道。它要求我们放弃做价值废墟上的清道夫，转而成为意义重建的工匠——在每个具体情境中，用受伤的手掌承接他者的苦难，用未被规训的双眼重审世界的可能性。正如阿席达卡在黎明时分走向新生的森林，人类也必须在价值冲突的荆棘中开辟共生的道路，因为真正的文明进步，永远始于对生存本身的忠诚。

3 伤痕中的痛苦、反抗与希望

阿席达卡手臂上诅咒所带来的持续性痛苦，是其存在困境的具身化象征。这疼痛并非单纯的惩罚，而是推动他觉醒与行动的动力。面对侵蚀躯体的诅咒，他没有将痛苦异化为仇恨（如野猪神）或偏执（如珊初期的复仇），而是奇迹般地将其锻造成通向他者世界的感知桥梁。这体现了尼采“权力意志”的创造性一面：不是支配他人的意志，而是超越困厄、将苦难转化为理解与生命肯定的意志。通过诅咒的疼痛，他得以共情野猪神的愤怒，感知森林的哀伤，从而在更深的维度上与世界相连。

这一过程与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形成精妙互文。西西弗斯明知推石上山永无成功之日，却依然坚定地投身于这一过程，在反抗荒诞本身中获得了充实与自由。阿席达卡亦然。他深知诅咒可能无法根除，调和冲突的努力可能反复失败，但他依然选择“推石上山”——介

入、调和、守护。每一次诅咒发作时的忍耐，每一次在冲突中的斡旋，都如同西西弗斯每一次推动巨石，不是无效的循环，而是对荒诞命运的一次次主动挑战与意义灌注。两者都将被动承受的苦难转化为主动创造，在永恒轮回的宿命里开辟出自由的可能。

因此，阿席达卡的故事构成了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回应。影片结尾的“不完美性”具有重要的哲学颠覆力。新生的森林带着灼痕，阿席达卡与珊分居两界遥望。“反面乌托邦实际上只是乌托邦这一理想的附属品而已。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最糟糕的愤世嫉俗者会成为最好的乌托邦者的原因，而且假如他们不必然地是最好的乌托邦者的话，他们也可能是乌托邦最微不足道的破坏者”此论点在阿席达卡的经历和影片结尾得到论证。宫崎骏拒绝提供一个乌托邦式的和解幻梦。这恰恰印证了奥斯本对乌托邦思想的批判：对完美、同质化秩序的追求，往往隐含着对差异与他性的暴力抹除，最终可能走向其反面——反乌托邦。阿席达卡选择留在交界地带，正是对“完美解决方案”的拒绝。他实践的不是矛盾的消除，而是学习与永恒的伤痕共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中，坚持对话、守望与具体的关怀。

这种“伤痕中的存在确证”，正是存在主义给予现代世界最宝贵的生存智慧。救赎不在遥远的、纯净的伊甸园，而就在当下、在伤痛之中、在未完成的行动里。正如贝克特笔下永远等待的戈多，希望并不存在于某个确定的未来终点，而存在于等待与寻找的过程本身。阿席达卡以他的全部旅程告诉我们：世界本质上是荒诞和伤痕累累的，真正的勇气与希望，在于认清这一真相后，依然像西西弗斯一样，选择推动我们的巨石，在具体的行动中，锻造并确证自己存在的意义与重量。

4 结语

通过阿席达卡这个被虚掩的“真主角”，《幽灵公主》完成了一部壮丽的存在主义成长史诗。它超越了生态寓言的层面，深入探讨了人在价值崩塌的荒诞世界中，如何自处、如何选择、如何与他人及世界共存的根本性问题。影片借助阿席达卡被抛、觉醒、选择、承担、痛苦直至在伤痕中确证希望的完整历程，生动诠释了萨特的自由哲学、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以及加缪的反抗精神。

在当今时代，面对愈发严峻的生态危机、文明冲突与意义虚无，阿席达卡的形象愈发闪耀出其启示性光芒。他教导我们，廉价的合一不过是另一种暴力，而真正的

出路在于“在不可调和性中坚持对话”的伦理韧性。救赎不在于幻想回到没有矛盾的去或跃入完美统一的未来，而在于像阿席达卡一样，勇敢地驻留在矛盾的现场，带着无法消除的伤痕，通过每一个具体、负责的选择与行动，在废墟之上，一点一点地重建生活的意义与共同生活的可能。这，便是《幽灵公主》通过其存在主义美学，传递给每一个现代人的、沉重而光辉的生命诗学。

参考文献

- [1] 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47.
- [2] 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煦良, 汤永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3]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三联书店 1987年版
- [4] 陈庆超. 卡尔·波普尔的反乌托邦思想批判[J].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4(01): 75-80.
- [5] 顾晓燕. 合谋的禁锢——从萨特的《禁闭》看自我的“异化”[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 (10): 165-166.
- [6] 李克. 自欺与自由——萨特哲学对人的存在的揭示[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28(01): 36-41.
- [7] 李军. 加缪的“荒诞哲学”及其创作实践[D]. 山东大学, 2005.
- [8] 张福海. 论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D].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 [9] Osborne T. Utopia, Counter-Utopia [J].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2003, (16): 123-136.
- [10] 李正宇. 自由的重负与存在的悖论——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与异化观的深层探究[J]. 文化学刊, 2025, (04): 47-50.

作者简介: 孙钰榆(2002.06-), 女, 汉族, 籍贯: 广东揭阳, 学历: 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动画与数字艺术。

曹晓晓(1987.07-), 女, 汉族, 籍贯: 台州, 学历: 博士。